

後 記

1998年深秋，我參加中國作家協會組織的一個代表團，到東北去採風。團長是吉狄馬加，副團長是牧惠。

作家們湊在一起，不論是車上、飯桌上還是閒談中、行進中，總是高談闊論，滔滔不絕。就在此前不久，張揚在《家庭》雜誌上寫過一篇關於我的報道〈作家吳越和他的三個同名女兒〉。《家庭》是大陸最暢銷的雜誌之一，銷量四百多萬冊，加上此文全國各地轉載的很多，僅就我個人所見，就有16家報刊轉載，被炒得沸沸揚揚的。代表團成員中，不論是認識的還是不認識的，大都知道這件事情。於是，關於我先後娶三個老婆並有三個同名女兒的話題，就不止一次地扯了出來。既然大家對這個故事感興趣，反正張揚老弟早已經把我的這些事情捅了出去，也沒有保密的必要，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詳細介紹。從我自己的婚姻故事又扯到了二勞改們的婚戀故事，話題越扯越遠，故事也越扯越多。有好幾次在飯桌上，盡聽我一個人說了。我一張嘴顧得了說話顧不上吃，飯沒吃飽倒不至於，吃得比別人少，卻是真的。

大家都說我講的故事不但有趣，也有內涵，都動員我寫出來。在座的傅小北，當時主管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期刊，手底下有五個刊物，他要求我寫成能獨立成篇的短文，由他拿去交給《追求》雜誌作為連載發表。

回到北京以後，我排開雜務，集中了一段時間，專門寫這篇文章。小北要求我每篇不超過五千字，總字數大約五六萬字，但是我一發而不可收，寫完了一看，居然有十幾萬字了。

小北感到為難：一期刊一萬字，還要連載一年多呢，這怎麼可能？

中國作協創聯部的徐忠志先生，是我們作家代表團的秘書。他對我這個故事也很感興趣，就把稿子拿去給《中國作家》雜誌。編輯同志看了以後，卻說字數太少了，如果能夠擴展到30多萬字，他們可以一期刊出，效果好，影響也大。於是我又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，把稿子擴充到30多萬字。徐忠志先生為了把牢起見，還把稿子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去看過，認為沒有問題，這才交給《中國作家》。編輯部看後答復：如果沒有別的阻礙，計劃1999年第五期一次刊出。事實上主編都已經簽了字的，本來以為是「鐵板上釘釘子」的事情，不會變的了。不料《中國作家》因為發了一篇「不合時宜」的文章，增刊被停了，編輯部也緊張起來，我的稿子一直沒發也沒退。直到2002年，文章依舊是「不發也不退」。看樣子，一時半會兒是發不了了。

有一次，我到《小說選刊》社社長柳萌先生家裡去，認識了工人出版社的資深老編輯王建勛先生。在一起吃飯的時候，談起了王建勛正在編輯一套「人之初」叢書，柳萌的長篇回憶錄《春天的雨秋天晴》就計劃編進這套叢書裡。我得知這個消息以後，就要求把我的這部回憶錄也編進這套叢書裡，不管《中國作家》以後是不是發表。王建勛先生叫我把稿子交給他看看再說。

稿子經過王建勛先生修改，並早早地送到了總編輯的手上。但是一壓就是好幾年，既不簽字，也不退稿。直到王建勛都退休了，總編輯還是沒有表態。原因也是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幾本不為當局所喜歡的書，而且大都是王建勛先生編輯的，為此出版社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通報批評，勒令停業整頓改正。在這樣的前提下，儘管我這本書的內容只是談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聞所見，但是主題離不開「右派」和「勞改」，仍屬於「敏感」的範疇。當總編的為了保住烏紗帽，這樣的書不敢發，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。

王建勛先生到總編輯那裡把稿子撤了回來，打算介紹給別的出版社。

又好多年過去了，經過王建勛先生和修正文化傳播公司老

總韓勃先生的努力，這部稿子先後在七八家出版社「旅遊」，總的情況，是編輯都看好，總編輯都不敢簽字。

大陸的出版界，情況奇妙得很：一方面是黨中央提倡作家「說真話」，可是只要你說了真話，中宣部那裡往往又過不了關。特別是2007年中宣部明確宣佈「反右」題材的書不許出版、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宣佈禁止章詒和等人的八部書不許出版，出版界的空氣更加緊張了。——從「道理」上說，中共中央宣傳部，是黨的部門，應該只管黨內事務，但是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，黨中央的宣傳部門，卻居然可以給全國的政府和出版社直接下命令！

用不著說，我的這部稿子，至少在這幾年內，是不可能在大陸出版的了。

2005年，吳宏達打算把這部《二勞改和女人們》納入他的「勞改叢書」，但是堅持必須修改。改什麼？他沒具體說。但我體會得到，是要改他和我「五妹」的那一段情緣。我提倡寫回議錄必須真實，記憶錯誤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，篡改歷史的事情我絕對不幹。因此，這部稿子在他那裡壓了好幾年，沒有採用。

2007年是「偉大的反右派勝利50週年」，香港開放出版社的金鍾先生想起來應該出版幾本書紀念一下，就在年初把我這部因為「不合時宜」在大陸擱淺了好幾年的稿子要了過去。但是開放出版社實際上就是《開放》雜誌的那幾個人，編輯部人手本來就緊張，加上他們一年之內出了《毛澤東：鮮為人知的故事》、《陽謀》和《趙紫陽回憶錄》等好幾部書，的確忙不過來。沒有趕上「反右」50週年這個日子，是有一些遺憾。2008年年初，有幸認識了大風出版社的王小強博士。這是一家純中立的出版社，而且是一家有抱負、有社會責任心的出版社，強調的是認真和真實，只要是嚴肅認真的作品，哪怕賠錢，他們也出。我這部作品，不敢說是什麼名著，但至少是嚴肅認真的，說的絕對是真話，不是什麼假話、大話、空話。我雖然曾經被別人劃為右派，實際上我是個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間派（我一生以反帝反封建為己任，但是對於「共產主義理想」，至今也沒有弄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）。我所寫的東西，僅僅是我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，強調的是「客觀」二

字。正確地說，我寫的這些，也都是「歷史」。我不僅沒有發泄不滿情緒的意思，更沒有借此攻擊誰、反對誰的意思。王小強先生能夠把這部在大陸無法面世的回憶錄首先在香港推出，我由衷地感謝。

這就是我這部書稿從產生到出版的曲折的經過。

下面再說兩件遺憾的事情。

第一件，1999年初，稿子打印出來交給徐忠志先生的時候，附有20多張照片。徐先生一看，這些照片都是十分珍貴的「文物」，怕丟失了，就把照片統統退還給我，說是等到要用了，再找我要。當年我搬家，由於書籍和稿件太多，混亂中，這些照片不知道放在哪裡，都找不著了。現在印的幾張照片，是臨時湊的。

第二件，稿子到了王建勛先生手裡，我就請牧惠先生給我這部書寫一篇序言，他也答應了。牧惠先生，是《紅旗》雜誌文藝組原組長，曾經執行、宣傳過「四人幫」的「極左」的文藝路線和政策；晚年深感愧疚，不論是寫文章還是開會發言，總是念念不忘「做檢討」，時時反省自己犯下的「罪行」，晚年的雜文，寫得十分真實並辛辣，是個具有「文人良心」的老人。沒想到2004年6月8日，牧惠先生意外地突然離開了我們。這裡只好把張揚先生寫的那篇短文，作為「代序」了。

早在1998年，張揚就在他的文章末尾預告：吳越將在他的晚年，寫一部絕唱，書名就叫《三個同名的女兒》。今年我已經77歲，大概已經到了「晚年」了，但是要寫一部「絕唱」，卻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。這一部，雖然主題是「二勞改」們的婚姻故事，卻已經包含了「三個同名女兒」的大致情況，即便還不全面，至少也是《三個同名女兒》的長編吧。